

1896 ~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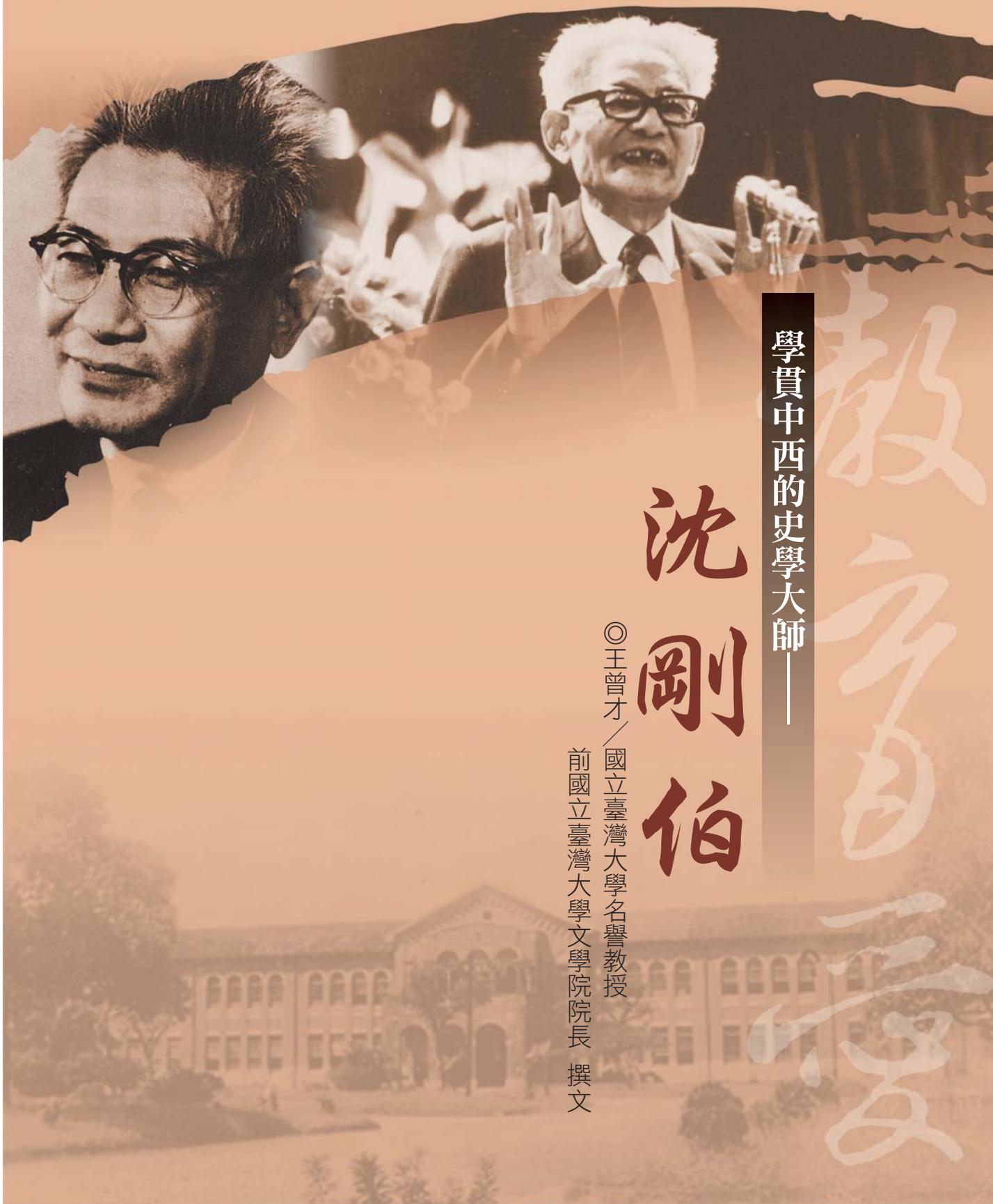
學貫中西的史學大師——

# 沈剛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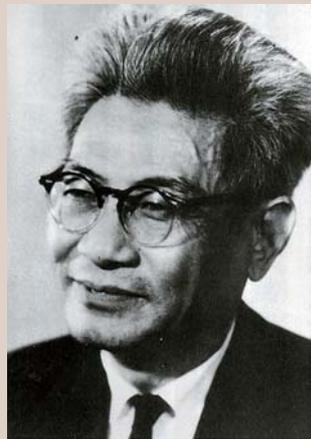
◎王曾才／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前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撰文

教  
育  
愛



沈剛伯先生（1896-1977）為史學大師，湖北宜昌人。武昌高等師範（國立武漢大學前身）畢業後，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深造，攻埃及學、英國史及憲政史。1927年歸國，先後講學於各著名學府，1948年應聘至國立臺灣大學任教。先生學貫中西，才思宏富，講課與演講一如長江大河，令人難忘：主持學術行政有年，建樹良多。他早歲致力於西方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晚年復著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闡發，有獨到的見解，發前賢未發之覆。197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剛伯先生（圖：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提供）

## 壹、生平

沈剛伯先生，湖北宜昌人氏，1896年12月4日（清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出生於宜昌市夷陵區三斗坪鎮梅花村，1977年7月31日逝世於臺灣省臺北市。

宜昌沈氏，耕讀傳家。先生之祖父達軒公為宜昌名儒，父萃庵（明道）公曾遊學日本，在他七歲的時候返國，1904年（甲辰，清光緒三十二年）全家遷居湖北省城武昌市。先生幼年受其祖父及父親薰陶與教誨，每日上午讀經、下午讀古文、晚間讀詩，幼年便讀完了《左傳》、《國語》、《國策》、《周禮》、《禮記》等古籍，此外還有大量的詩文。所以能夠在接受新式教育前，便已打下非常紮實的國學基礎。他十一歲時入湖北方言學堂攻讀，三年後畢業，此時期仍繼續讀《莊子》、《荀子》、《史記》、《文選》、《方輿記要》，乃至《金剛經》、《華嚴經》等書。十四歲（1910）畢業後進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武漢大學前身），1917年畢業。1924年考取湖北省官費（公費），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進修，攻埃及學及英國史和憲政史。1927年，先生自英倫返國，此後即執教國內各著名學府並主持學術行政工作，作育英才無數。

## 貳、教育事蹟

先生于 1927 年返國後，先任教于國立武漢大學，不久學校發生學潮，轉至中山大學。1931 年應朱騷先（家驊）之邀，至國立中央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先生在中央大學時，先後開設「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俄國史」、「印度史」、「法國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論」等專門科目和國史等一系列課程。當時在中國大學講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史課程，尚無第二人。他實為開闢世界史教學與研究的先驅。他授課時，不帶講稿或大綱，娓娓道來，一如目擊，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滔滔不絕而又有條不紊。1942 年秋，他繼金毓黻先生又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在外患日亟中，倡導西北邊境問題之研究，組織邊疆研究會，延聘專家講授維吾爾文，又敦請韓儒林先佳講新疆史、蒙古史，以及金毓黻先生開東北史。在國內大學歷史系中，重視邊疆史研究者，首推先生主持之中央大學歷史系。抗戰期間，中央大學遷至重慶，先生常應邀赴四川各校講學。1944 年，他到當時在四川三臺的國立東北大學短期講學。抗戰結束前並在重慶中央幹部學校研究班兼課，勝利之後，即未再兼。抗戰結束後，先生即行離開中央大學，本已應胡適



■ 沈剛伯任臺大代理校長與委員於溪頭林區留影紀念  
（圖：沈念祖女士提供）



■沈剛伯任西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教授時留影  
(圖：沈念祖女士提供)



■張岳軍（右二）、沈剛伯（左二）等人於柏林圍牆前合影  
(圖：沈念祖女士提供)

的聘請，備赴北京大學執教。但是，後來卻渡海來臺。據沈夫人曾祥和教授回想：1948年，臺大校長莊長恭離校，當時教育部長朱驩先（家驊）力邀先生繼任。先生以為當時臺大百廢待舉，校務繁劇，非有雄才大略，如傅斯年者不能勝任，朱乃改聘傅氏。傅下機後見到先生第一句話就說“你怎麼整我這一下？臺灣如有不測，我只有跳海啦！”傅校長接任後大力整頓，奠定臺大以後在教育及學術界崇高地位的基礎。不幸次年猝逝。主持臺政的陳誠先生堅邀沈先生繼任校長。先生力辭並推薦時任臺大教務長才學兼備的錢思亮先生升任。雙方一邀一辭，遷延將近一年始行定案。（錢氏在1951年年底始接事）以後錢校長每

次出國均邀沈先生代理校務，出國參加國際校長會議亦曾由沈先生代表出席。沈先生應聘講學臺大後，即以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暨歷史學系主任。其後歷史學系主任自1950年初免兼，但主持文學院院務則直迄1969年始卸仔肩。先生在臺大任教的時間很長，計自1948年至1973年退休，共有二十五年。在此期間，曾於1965年至1966年應聘前往西柏林（註一）自由大學講學一年。臺大退休後，臺大仍敦聘為兼任教授，並應輔仁大學之聘為該校講座教授。總計先生1917年自武昌高師畢業後即在該校附屬中學教授歷史與英文起，至1977年遽歸道山為止，振鐸鬢宮屆滿整整一甲子。

先生在臺大時建樹良多，他所留下的永久性的紀念之一，便是為臺大撰寫校歌：

臺大的環境鬱鬱蔥蔥，臺大的氣象勃勃蓬蓬。  
遠望那玉山突出雲表，正象徵我們目標的高崇。  
近看蜿蜒的淡水，他不捨晝夜地流動。  
正顯示我們百折不撓的作風。

這百折不撓的作風，定使我們一切事業都成功。

此歌詞後由趙元任譜曲，1968年12月正式頒行，它有四個版本：校歌合唱（交響樂版）（choir with organ）、校歌合唱（鋼琴版）（choir with piano）、校歌合唱（無伴奏）（choir without accompaniment），以及校歌交響樂（accompaniment only）。



■臺大歡送沈剛伯榮休紀念照（圖：沈念祖女士提供）

註一）西柏林（West-Berlin）為1949至1990年間對德國柏林西部地區的稱呼，原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美、英、法占領區，其東則為蘇聯據有之東柏林。1990年德國統一，柏林東、西區再合併為一。西柏林大學設置東亞研究，堅邀沈先生出任首屆主持，聘之為終身職。先生力辭未就，臺大校方亦以敦睦邦交，勸先生接受，但不願先生離開臺大。先生更不願長適異國，於是僅由臺大借聘一年。自由大學的學生對先生極為崇敬，稱之為 Papa Professor，先生返國後猶有學生來臺探視。

## 參、教育貢獻

先生主持臺大文學院期間（1948年至1969年），對院務的推展和學術水準的提高，均不遺餘力。為了拓展學域，於1949-50年學年度增設考古人類學系，1961-62學年度又增設圖書館學系，使原有四系（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增為六系。先生於圖書館學系至為重視，曾自兼系主任，對該系師資延攬與圖書設備也至為注意。1965年6月，圖書館學系第一屆學生畢業時，先生特致賀詞說：「圖書館學系是臺灣大學的一個新系，我們要養成日新又新的精神，不斷吸收新知識，擴大領域，以刷新發揚我們已有了兩千多年歷史的圖書館事業和學問。」在研究所方面，1949-50學年度設文科研究所，1956-57學年第二學期起改為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四個研究所，1966-67學年度再增設外國語文學研究所。1967-68學年度起，中國文學研究所及歷史學研究所開始設博士班，歷史學研究所分設為一般史組、近代史組和中國藝術史組。



■臺大文學院舊景  
（圖：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提供）

先生以為我國幅員廣闊，歷史悠久，地下史料藏極富，亟需一所培養高級考古人才的機構力主設立考古人類學系，由李濟之（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等大師執教，培養出張光直，宋文薰等國際知名的學者。

先生以為早期中國大陸居民移往臺灣必然經過澎湖，因于考古人類學系設置之初，即請救國團出資贊助前往發掘，收獲豐碩，是為國人在臺的首次地下發掘。

政府遷臺以後與大陸斷絕來往，先生為求保存少數民族語言特請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廣先生在臺大教授文，造就陳捷先先生及李學智先生等傑出學者，對於清史研究貢獻多。又請蒙學者扎奇斯欽先生在臺大教授蒙古史，並將元史用蒙文解釋，對於讀書及其時代背景之研究頗多助益，因而產生蕭啟慶先生等出色的元史專家。

政府遷臺之初國困民窮，學術界于外國甚少交流，先生倡議召開亞洲史學研究會。亞洲之外，歐，美學者亦有參加。外國學者返國之後，對於臺灣情況多稱道。臺灣當局自此對於國際學術會議召開常表贊同並與補助，中外學術交流為之暢通。

先生以為中，日，韓三國語言文化多相通，在世界阿爾泰學中是一主要支派，因之贊同成立東亞阿爾泰學會議，在臺，日，韓輪流開會。1969年秋季在臺開會，由臺大文學院主辦，先生擔任大會主席。

先生於1957年至1972年間，與李濟之（濟）共同主持有美國經費背景的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該委員會係由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其工作為主持與鼓勵：（一）東亞學術研究；（二）東亞各國漢學家之聯繫；（三）本區學者與亞洲其他地區和西方各國漢學家之聯繫。該委員會獎助的研究計畫分為五類：個人研究（除個人專題研究以外，還包括關於原始文字、蒙文、藏文、滿文等方面的研究）、集體工作、編纂、訓練及出版。該委員會在我國成立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即後來的國家科學委員會）以前，對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的研究，發揮過相當的鼓勵作用。

先生也深感有結合從事史學研究與教學的人士組成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必要，在1954年3月，與若干史學先進倡組中國歷史學會，並被推舉為該學會第一屆理事會之理事長。該學會理、監事成員中多博學鴻儒，如胡適之（適）、張曉峰（其昀）、方杰人（豪）、錢賓四（穆）、李濟之（濟）、姚從吾、羅志希（家倫）、蔣廷黻、蕭一山、勞貞一（榦）、郭量宇（廷以）、劉壽民（崇鉉）、張致遠（貴永）、董彥堂（作賓）、毛子水、朱驥先（家驊）、李玄伯（宗侗）、凌純聲，等等。

先生對啟發與提攜後學甚為用心，常勉人「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教人以為學之道在博、貫、約。他認為當今之世，已無往而非學問，吾人以「有涯之生」，若仍要「博」，必須先定一個「博」的範圍，不應在專門學問上求「博」，而只可在工具學問方面求「博」，而這最重語文能力，一個勤學的人能在上十年內，把三五種古今文學學得有閱讀能力，便算博學。然後找出一個執簡御繁之道，這就是「貫」字的工夫，然後再從事於「約」，選取畢生鑽研之業。先生以自身曾經長時期從事史學研究、教學和負責學術行政



■臺大一景「怒髮衝冠」  
(圖：沈念祖女士提供)



■民國 62 年沈剛伯退休演講 (圖：沈念祖女士提供)

的經驗認為教師的任務有三：一是教書；二是陶冶學生的性情，啟迪學生思想，發展學生的特質；三是作高深研究。他在揭櫫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方針時，披露他對史學教育的主張：講求「史義」以根絕一切史演之學，培養「史識」以補考證之不足。他進一步地指出「史義」包括：（一）嚴夷夏之防；（二）明人倫之教；（三）辨王霸之道；（四）通古今之變。他之所以於講求「史義」之外，還要講求培養「史識」是因為：（一）考證可以辨史料之真偽，定史料之年代，但不能評判其價值而發揮其作用，若欲化腐為奇，非靠史識不可；（二）任何時代歷史的全貌已無法恢復，但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卻可於古人記載的字裏行間推測出來，這又有賴史識。先生本此精神，推行史學數十年；在做人處世，也常以「量才適性」來勉勵後進，使他們有所依從。他春風化雨，誨人不倦，作育人才，不可勝數。

先生教學，至為成功，在課堂上解析入微，見地新穎。凡是上過他的課或聽過他演講的人，都很難忘記他那磅礴的氣勢、淵博的論證和揮灑自如的丰采。他給人的印象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另外，他亦不太修邊幅，尤其甚少梳理頭髮，口中常銜香煙，其形象常被稱為「臺大一景」，學生私下以「怒髮衝冠，口若懸河」形容之。

## 肆、學術見解

先生為史學巨擘，中西學養俱臻圓熟的上境。他先是致力於西方史學與文化的研究，晚年又著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闡發。他相信人類各個社會的文化發展，同中有異，也異中有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此，他的視野遼闊，他的世界廣大，能夠不局一隅也不限一時，跨越中西的範疇，作融會貫通的透視，因而每有獨到的見地，發前賢未發之覆。在史學方面，他認為「史」的原義只是寫字的人，並不是「記事者」。所以，他認為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把「史」解釋為「手持中正」的記事者未免過於牽強，因為如此進步的政治思想絕非遠古創文字的人所能有的。他又指出，在早於商、周的埃及、巴比倫，會寫字的人都是祭司。在後於秦、漢的歐洲中古初期，能寫字的人也均為教士，中國在商、周時期亦如此，所以《周禮》將史列為「春官之屬」。春官執掌邦禮，也就是管理宗教的事務，《國語》也肯定了史的原始職掌為安排祭祀。但古代史官有時也兼管卜祝，後來其職掌逐漸擴大，惟「史」為一種人的名稱或職銜，而非指書。先秦之時尚無以史名書的用法，我們稱為「史」的，在古代或名「書」，或名「志」，或名「乘」，或名「檣機」，或名「春秋」。他指出，太史公司馬遷第一個用「史記」二字名其書，其義是說「史官之所記」。以史作為書名，使之成為專問之學，在中國實自司馬遷開其端。

先生很有名的主張，是「史學」與「事變」密切的關係：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他認為，固然世界有了人就有了歷史，但有了歷史，不見得就產生史學。古代有過文化水準相當高的民族，如埃及、巴比倫、希伯來、印度等，都產生過很優美的藝術，很玄奧的神學，也有過很實用的科學，但卻未能產生史學（雖然留下不少珍貴的史料），此因這些文化皆以神道為主，而這種以超自然的勢力為依據的文化是不會產生史學的。能產生史學的文化一定是以人道為本，也就是說：它承認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用自由的意志，經過理智的考慮，而後創造出來的。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各古代文化，只有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希臘纔有史學，可是這種史學並不是在這兩種古文化一開始就有的，其產生實在那些文化已經



■沈剛伯先生  
（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提供）

相當發展之後而忽然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候，亦即當它們的政治結構瀕臨崩潰，社會組織大大動搖，經濟生活和禮教活動都有很大的轉變，那時才產生史學。中國正式產生史學的時間是在孔子修《春秋》之後，而中國史學發展的軌跡，則為每當文化大變遷的時代，同時也是史學更邁進一步的時候。因之，時代安定不太變動，則史學反而較為沉寂，唐代那麼強盛，但史學遠不如三國、魏、晉到六朝的時候。

先生對古代中西史學及其異同有很深的瞭解。他認為史學必須具備的條件有：（一）對直接、間接的史料有精確

的考証；（二）對雜亂的史料有成系統的排列；（三）對歷史的發展尋出因果關係；（四）對過去的史實有正確的解釋同評價；（五）使古人的陳跡成為有益於今人的知識；（六）由歷史知識培養成歷史思想。他一再指陳：中國的史學始於孔子而成於司馬遷，西方的史學則始於赫若多大士（Herodotus）而成於波李比亞士（Polybius）。但是，中西史學有其差異，這包括：（一）對於變的觀念不同，中國史學把「變」看成宇宙間一切事事物物演進的自然現象，而想從其過程中探求一個合理的途徑；西方希臘人則認為宇宙本體一切事物的本質是不變的，因果律可以應用到史學方面在歐洲是十七世紀才知道的。（二）對於天人關係看法不同，中國人沒有把天看成與人對立的主宰，西方相信宿命決定。（三）徵文、考獻各有所偏，西方偏重當事人的親口報告，中國重徵文而輕考獻。（四）史筆的不同，中國古代史官記事以「原心定罪」為義法，有時有曲筆，西方則追求真象。

先生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發展與演變，也有一些可供治學者參考的意見。他認為周朝王室並沒有儒家那麼稱頌的「仁政」，指出「周人是一個紀律嚴、

賞罰明、效率高、武力強的民族，曾用嚴刑峻法來部勒全民。」他主張用社會的觀點來研究古代的歷史。他特別指出，他是根據去古較近的史料，從多方面證明周室不可能有後世儒家所說的仁政，目的只在探求古史上的一部分真象。他曾用古代禮、刑的運用來探討法家的來歷，認為社會的類型決定禮、刑的運用，而古今不同者，在於古代禮繁刑簡而酷，近代則禮簡刑繁而輕。周民族本來很嚴酷，但幽王、厲以後，王綱陵夷，齊、魯諸國，別闢途徑，但晉、衛、鄭因為環境和歷史的關係，仍守周之舊典，略加損益，就演成了它們獨有的官術。這三國也是法家的源流之地。他認為，法家雖有重勢、重術、重法三派，但如果沒有法就不能造成天下無敵之勢，也無從運用循名責實之術，所以三者皆以法為最重要。戰國時的法家只是把那種當時實行的官術，加以整理、組織、演繹、敷陳，實未曾根據個人任何抽象的思想，創立一種新的政治學說。此外，他舉証說明春秋戰國時的齊國建國於周公攝政之時，並且發展出其特殊的文化：陰陽家的學說、「方僊道」的信仰、黃老之言的思想和兵家之學，等等。這些源自齊國的特殊的文化因素，對於中國後來的歷史發展，有其重大的影響。

先生還有一些其他意見富有啟發性，譬如對於「農民暴動」或「農民起義」的問題，先生也有所澄清。他指出：中國一向以農立國，歷代的英雄好漢爭天下，用的兵當然來自農民，土豪流氓造反，被裹脅的群眾也確實原來是農民；但這些白受犧牲的農民均係被迫參加，他們自己實毫無目的之可言。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暴動的領袖人物，自陳勝、吳廣、樊崇、張角，以至黃巢、方臘、洪秀全、楊秀清等等，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農民，也沒有一個實地為農民謀過福利；無論他們假藉什麼宗教邪說或其他主張來愚民，破壞社會制度以洩忿，其終極目的都在「稱孤道寡」。他也對中國農村與農民問題提出看法：中國只有崩潰的農村而無暴動的農民；中國雖窮，卻早已不是封建社會；動亂雖多，卻沒有一次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他也曾以中、西史實的發展，來探論中國知識份子地位的升降沉浮，而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結論，對於後世人與學分途的情況深為感嘆。他分析近代中國悲劇的基本肇因，為中產者的破產與知識份子的沒落。前者係因在飽受帝國主義的各種勢力的剝削之

餘，又遭受國內破壞力量的宰割，後者則由於各種複雜的社會因素，知識份子被迫以學問作為「謀生的工具」，走向「媚俗」之路。他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尤能作同情的瞭解。他在臺北一次文化復興的座談會中，引用孔子的話：「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來比喻文革當時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處境。他說這是說機會好一些得以逃出來的，是「去」之；在強制高壓下被奴役的，是「為之奴」；少數起而抗爭的，就必「死」。

對於向來兼容並蓄，從不排外的中國文化何以不能順利地接受西方的科學文化？先生所提的答案是，中、西雙方的生活習慣和價值取向不同，尚非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在於：第一、西方文化隨船堅砲利以俱來，使國人在民族情緒上發生厭惡恐懼的心理而產生排拒；第二、因為儒、道、佛諸家均鄙視功利，視西方資本主義所養成的工業化社會認為不健全。他認為，中、西文化接觸以後的中國文化的發展，是不幸到宋代因禪宗盛行才發生改變。他也指出：文化最忌定型，一定型，便失去彈性。就中國的文化發展看，他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藝復興，而此一新文化運動始於建安七子所倡導的文學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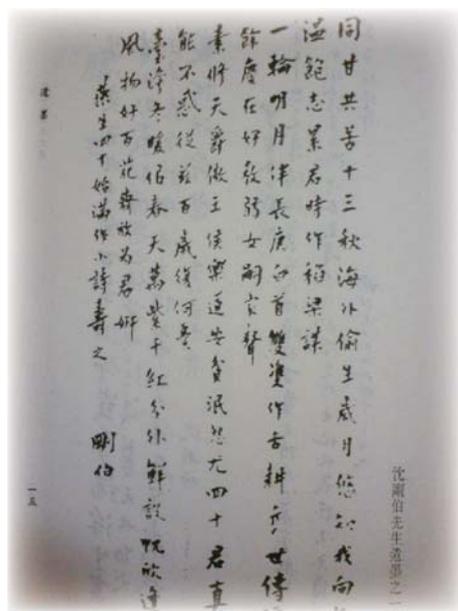
先生的學養，從不同角度，都是包羅萬象。大概很少人知道，他也精研命理和善批八字。他研究此道，是早年的事，而且完全是學術研究的途徑入手。他認為，八字命理之學是從近東傳至中土，本來僅為六字，後來在中國有了進一步發展，乃演為八字。不過，他認為推算命理，充其量只有歸納法和統計學上的意義。他的涉獵命理與他的力排眾議，認為陰陽家也是中國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有相關的地方。他認為，陰陽之學本是初民時代一種迷信與真理混雜不分的原始科學，它的目的和作用在解釋自然、適應自然，利用自然，此與宗教之完全皈依自然不同。而且，它的範圍很廣，包括天文、曆算、醫藥、技藝、地理、水利，乃至武學。所以它「並非僅以占卜、禱誅為事的」。陰陽家對中國文化，尤其是科技、醫藥方面的貢獻很大，從《三統曆》、《傷寒論》、《本草綱目》到《天工開物》皆為陰陽家的作品，於此可見一斑。

先生廣受文史界的敬重。1976年他八十歲時，有二十位他的朋友和學生，為崇功報德，為他出了一本《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他們是（依論文次序）：史次耘、昌彼得、金發根、王叔岷、阮芝生、張光直、余英時、遼耀東、陶晉生、徐玉虎、劉家駒、屈萬里、梁庚堯、居蜜、何烈、徐泓、楊宗元、王曾才、臺靜農、鄭騫。

## 伍、追思

先生身體素來健康。1956年他患肺結核病，後在臺大醫院治癒。1965年他七十歲時罹肺癌。後來經臺北榮民總醫院悉心治療，主治醫師為當時頗負盛名的外科部主任盧光舜，幸告痊癒。出院後，連續每年追蹤檢查，均由盧大夫親自主持，發現完全康復。筆者清晰地記得盧大夫在追蹤檢查的最後一次所發表的結論：「恭喜！恭喜！沈教授您的病是完全好了。這表示，我們現在的醫學仍有許多不能解的問題，這是一種神妙的事情。」當時大家歡騰不已，但先生仍然是亭峙嶽立，面露微笑，這份制靜的工夫令人折服。最後數年，他因為年事日高，先後患目疾、腰腿不適、攝護腺肥大及膀胱炎，最後終因肺臟衰竭，於1977年7月31日逝世。

先生給人的印象是「述而不作」，事實上，他也留下不少可以傳世的文章。臺北中央日報在他身後，整理他的遺作，於1982年出版了《沈剛伯先生文集》，上下兩冊，都五十餘萬言，書中分史學、哲學、文學、教育、世局、記事等類。1988年1月，時任教育部長的李錫俊（煥）出面召集成立「財團法人紀念沈剛伯先生學術基金會」。



■沈剛伯先生遺墨（圖：攝於《沈剛伯先生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提供）

先生駕鶴西遊後，其門生在風光佳勝的南投溪頭臺大實驗林區建立「沈剛伯先生紀念亭」一座，以表達「薪火相傳，懷德不忘」之情。亭內存一座高大的《剛伯亭碑記》石刻，古肅莊嚴。它最後寫道：「宋代歐陽永叔，曾有銘文。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蔭。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剛伯亭俯瞰山木之勝，誠屬人間幽境。後之來者，登臨此亭，追慕前哲，永念教澤。沈師之風霜高潔，寧靜淡泊，將為後世人所懷念。」（註二）

註二）見溪頭臺大實驗林區《剛伯亭碑記》